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批评之路

[加拿大] 诺思洛普·弗莱 著

王逢振 秦明利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616898

✓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42.2081

WN

1

批评之路

[加拿大] 诺思洛普·弗莱 著

王逢振 秦明利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之路/(加)弗莱著;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诺思洛普·弗莱研究丛书)

ISBN 7-301-03613-2

I.批… II.①弗… ②王… ③秦… III.文艺社会学 IV.I0-05

书 名:批评之路

著作责任者:王逢振 秦明利、译

责任编辑:江 溶

标准书号:ISBN 7-301-03613-2/I.0459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

印刷者:北京飞达印刷厂

发 行 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375印张 12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8.5 元

总 序

在二十世纪群星璀璨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有一位加拿大人的名字格外耀眼,他就是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正是这位伟大的加拿大学者,以其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卓越贡献而被载入史册,他的思想理论不断地被东西方学者和理论批评家引用和讨论,从而为加拿大的文化和文学从“边缘”逐步向中心运动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正是出于对弗莱的遗产发扬光大、把加拿大文化和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之目的,我们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处,尤其是王仁强(Richard King)参赞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编辑了这套“弗莱研究丛书”,旨在把中国的加拿大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深度,同时也让弗莱的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产生相互启迪的作用。

弗莱作为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大师级思想家和理论家,其贡献和成就表现在诸多方面,这里仅作一简略概括:(1)作为一位文化哲学家或文化革新者,弗莱毕生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使其在国际文化理论界独树一帜;(2)作为加拿大在国际学术界的主要发言人,他的学术思想和批评理论曾一度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其后又逐步被再度“边缘化”的历程,但到了临近世纪末的今天,人们又发现了他的理论的潜在价值;(3)作为一位有着世界性影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所开创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五六十年的西方文论界形成过“三足鼎立”的局面;(4)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元批评理论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他的

理论对结束“新批评”在英语文学和文论界实际上的一统天下和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的兴起有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弗莱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属于任何一个学术理论流派，但他同时却又能与任何一个当代批评流派进行对话，引发他们争论，给他们以启示。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要联合国内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同行共同编辑这套丛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在此我们谨向加拿大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慷慨资助使这套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同时我们也感谢出版这套丛书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没有他们的支持和编辑们的辛勤劳动，本丛书也不可能顺利出版。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不仅能对中国读者认识弗莱及其理论有所帮助，同时也能对整个弗莱研究有所贡献。

弗莱研究丛书编委会

1995年9月

《批评之路》：重构文学批评

——译者前言

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是二十世纪加拿大、乃至北美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的剖析》改变了文学理论,结束了“新批评”的统治;而他对美学理论、神学、以及社会批评的研究,则确立了他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相信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相信神话与意识形态相关并可能反对意识形态,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处于当代重要理论争论之一的核心: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叙述和想象的关系。

这里翻译的《批评之路》(The Critical Path, 1971),其核心同样是神话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或叙述和想象的关系,但因他侧重于文学批评的社会语境,所以也可以说是他重构文学批评的一次努力。他在开篇第一章就明确指出:“我需要的批评道路是一种批评的理论,它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一种看法。”“我拒绝这样的看法:‘批评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因为那显然是无稽之谈。批评是文学的理论,而不是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次要的和非基本的因素。”(见本书第1页;——以下凡注页码处均指本书页码)

弗莱试图集中于文学的两语境之一,以文学的想象的语境对普通的意图性话语的语境,以便他能够回答自己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如何达至诗的意义?”(第2页)他重申一条久已存在的原则:

“只要一首诗的意义……主要在意图性话语的语境内寻求，它就会成为一种文献，与文学之外的某种文字领域相关。”(第3页)弗莱认为，文学的一切文献观念都是文学的寓言概念，例如诗被读作弗洛伊德的压抑、未解决的冲突、或自我和本我之间的张力等等。通常有三种类型的文献批评：传记的，心理学的和历史的。弗莱要求一种历史的批评，即将文学视为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他把“从根本不是文学的东西中寻求文学基本意义的冲动”称为决定论(第5页)，并认为文献的方法和外在的方法有三个局限：它们不说明文学的形式，不说明形而上的和诗的语言，不说明诗人与其给定的语境常有的否定关系。(第5—6页)

弗莱在论及他自己思想的历史起源时，重申了他的中心神话，将诗称为一种交流的技巧，涉及到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思想。他的历史批评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史，而不是将文学纳入另一种类型的历史。在研究这种历史方法中，他看出了原型的重要意义，看出了“文学传统中某些结构因素”的意义，“如常规、文类、以及对意象或意象群的反复运用”。(第8页)弗莱认为，在文学内部，常规似乎比历史更有力量，因为诗的常规的变化少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诗人和前代诗人的联系与学者和前代学者的联系一样，都是对前代作品的有机整体增加某些东西。(第8—9页)他论证说，一种历史感就是在文学的更大结构原则(常规、文类和原型)的历史与文学和非文学背景关系的历史之间的某种平衡(第9—10页)，而批评的道路则是使文学结构的研究与转向外部其它文化现象的转变之间达到平衡。批评不是阅读的叙述运动，而是后来把文本作为一个同时存在的结构进行考察。

在《批评之路》里，弗莱试图将修辞阅读纳入由结构研究所产生的一种演绎框架，从而使语境显示出需要分析的中心意象。他说，批评是一种知识结构，而一首诗的阅读则是独特的、不可知的；换句话说，批评是“经验失败的一块标石”(第12页)。弗莱并非轻视阅读，相反，他认为“真正的读者”进入一种连贯的经验结构，并能够通过批

评的帮助认识那种结构。通过对文学常规、文类和原型的研究,读者会发现文学的客观“同一性”;而且这种同一性不断变化,并不拘泥于伟大的经典作品。“感伤的”反应是批评的开始,它包括对文本一致性的解读(第14页)。但在解构主义当中,恰恰是差异而非一致才形成了批评或理论的著作。不过,弗莱也认识到,文学的目的越来越不具有有一致性,而是经验的强化,是理想经验的构成。

弗莱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一些现代主义的文本,如乔伊斯作品中的灵感和顿悟,因而可能不适用于阻碍理想经验的后现代的文本。过去几十年来,是否有过从根本上摒弃传统,或者是否要求革命和创新并取消传统和常规是一种可疑的姿态?这对于弗莱的批评理论与现时语境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吸收传统的基督教观点,认为“文学、哲学和宗教,至少都是对某种经验的有力的类比,而这种经验不仅超越表达性,而且也超越人类的能力”。(第15页)通过清晰表达出来的类比(文学是其重要的一种),人们使自己或自己的某些方面与理想的经验世界认同。于是,弗莱的批评道路穿行于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是决定论的离心性错误,或阅读文学的内容并将它与非文学事物相联系的运动;另一方面是直接经验的向心性错误,或趋向于评价及批评家的社会焦虑的倾向。(第16页)

弗莱认为,一个社会从神话建立一种神话学,这些神话是对宗教、历史和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故事,它们与传奇和民间传说有相似的文学形式,但相互联接在一起产生一种不同的社会功能。当神话学在一种文化的中心变得明朗化、具体化时,它周围就会出现一种神奇的怪圈,文学的发展受到某些限制,例如语言、参照或信念的限制。(第18—19页)在《批评之路》里,弗莱考察了神话的文学方面,更具体地说,当一种文化扩展时它如何产生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神话学,形成社会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或者说关怀的神话。(第19页)关怀神话在这里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其中现实和真理通过社会确立,从而使关怀说出信仰的语言。弗莱注意到,“社会关怀对

文学的影响就是使文学具有强烈的传统性,重复与那种关怀密切相关的、一般为诗人的读者所熟知的传奇和学识”(第19页)。弗莱指出,有两种人类的世界:自然环境和文明化。今天大部分关怀神话不是为上帝而是为人类保留下来,它们有一种创造性,包含着与欲望和实际技巧相联系的现实或真理,也就是“应该”和“实际”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们听到改变世界重于研究世界,那他们就听到一种关怀神话的出现,它要求贬低所有的自由神话。弗莱为关怀与自由之间的张力作了这样辩护:

当关怀神话以自己的方式占有一切时,它就变成最卑劣的暴政,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它自己的策略,对回避它的特殊迷恋的所有人类生活怀有敌意。当自由神话以它自己的方式占有一切时,它变成权力一结构的一种懒惰的、自私的寄生物。《1984》里的讽刺向我们展示毁灭了它的自由的社会,而《美好的新世界》里的讽刺则展示出忘却了它的关怀的社会。两者应该同时存在,只有它们同时存在真正的个人和自由社会才可能存在。(33页)

由此可以说,弗莱的作品既是自由的又是保守的,既是革命的又是传统的,因为这些是他在自己研究的文学和自己生活的社会内部所看到的真正的张力。

弗莱与他描写的人文主义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和多方面的,所以他们能够保持一种社会视角,了解他们整个的社会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专门化的学者,但又能够将那种“专门化”与一种综合的社会观联系起来。(第38页)像他所说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弗莱对秩序和戒律也有一种保守的忠诚,但不是极权主义的社会观。弗莱认为,对诗的意义没有任何确定的解释,因此一种释义必须对这种底蕴的思想结构提出文字说明。他针对马修·阿诺德关于关怀神话的看法指出:1969年,在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

状态》发表一百年之后,任何写这一主题的人都必须认识到,这两种力量的对抗已经发生了转变,完全不像阿诺德预想的那样:人文主义社会已经消失。(第45—46页)对于后人人文主义世界(Post-humanist world),弗莱以反讽的方式写道:“今天,从社会角度来说,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处于塞拉库斯阿基米德的地位。如果他处于一个不同的位置也许他会使世界运动,但是处于他目前的地位,只有当他不被罗马凶恶的蠢人注意时他才能继续他的工作。”(第48页)由于诗人失去了人文主义时期那种谈论关怀神话的权威,他便转向想象和文学,而其他非文学的作家则赋予关怀神话以一种理性、逻辑和历史证据的意义。

弗莱认为,社会在技术方面越是发展,诗就越是变成第二位的需要。它现在成了一种装饰或审美的客体。随着技术的发展,常规在艺术里衰落,词语的共同性也会在诗里减少。当技术和机器统治社会时,诗人在社会里会发生异化。因此弗莱认为,现代诗人不可能成为自由神话的核心。当人文主义消失时(弗莱称阿诺德是最后的人文主义者之一),它那种在既定关怀框架内发生作用的精英社会也就消失了。于是,由那种语境产生的批评家即法官的概念也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但弗莱不同于阿诺德,因为他作为一个批评家的作用不同。按照弗莱的看法,文学是关怀的语言,但不是关怀的神话。批评是一个正在扩展的领域,而文学“展现种种想象的可能,展现一系列构成所有关怀神话的文字的虚构、模式、形象和隐喻。因此现代批评家是神话学的学者,他的整个主题不仅包括文学,而且也包括神话的构成和信仰的语言所进入的关怀的领域。这些领域构成神话学的主题,它们包括大部分宗教、哲学、政治理论、以及社会科学”(第65页)。

弗莱通过类比和分析指出,批评家的标准是自由神话的标准:批评家依赖于证据和证实。由于脱离了道德和评价的批评,现代批评家必须容许各种诗人和诗的表现形式,而不能偏爱一种风格而不喜

欢另一种风格。批评家服从于他们时代的焦虑，诗人与其时代的关系是他们研究的“自由因素”。（第 66 页）批评家把现时与其过去和继承者相联系，因为“一种不关心自己过去的文化不可能预防未来”。（第 67 页）作为一个历史批评家，他会继续人文主义传统，其自由的性质主要产生于它独立研究过去的的能力，但作为一个当代人，批评家研究自己的关怀，观察它与过去的关系。在讨论摩尔的《乌有乡消息》时，弗莱说自由有两个部分，沉思和创造性想象。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或在单个文本中说出的东西，包括人的本性和命运的直觉，类似于政治或宗教神话中对关怀的系统阐述。（第 68 页）

在从关怀转向想象的过程中，弗莱提出，在这个分裂的时代，“演绎综合的伟大梦想——其中信仰和知识分子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正在消逝”，在“应该”和“实际”之间有一道存在主义的鸿沟，“一种革命的和改革的选择行为”（第 70 页）。只有承认关怀和自由之间的张力，宽容或多种关怀才能在社会中存在。（第 73 页）知识本身不可能使我们获得社会的想象，提出对我们的知识应该做些什么。（第 74 页）于是，意识形态变成了弗莱主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并非我们说我们相信或我们认为我们相信的东西，而是我们的行为表明我们相信的东西；任何不是一种行为原则的信念，都不是一种真正关怀的信念。马克思主义对非本质的信念有一个概念，即那种被谈论而不依据它行动的“意识形态”，它具有修饰保守态度外表的功能。我的许多读者会把我所说的关怀神话称之为一种意识形态，虽然正如我表明的那样，我有特殊的理由运用神话这一术语，而那些喜欢意识形态的人仍然在大部分语境中将它取代。（第 76 页）

通过追踪弗莱论述的主要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批评之路》讨论的似乎是一些互不相同的问题，如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60 年代的文化，等等。但十分明显的是，弗莱的中心思想是两种

相对立的社会神话——关怀神话和自由神话。前者侧重保守性和共同性,强调权威、信念和一致性;后者侧重自由和个人,强调宽容、客观性和对应性。弗莱认为,这两种神话的结合会产生出文学的社会语境,从而导致他所主张的社会批评。

弗莱在关怀和自由之间贯通他的批评道路,力图保持两者的平衡。但他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而是采取了旧的哲学传统,其中理想的社会只有在对立面的张力中才能存在:“正如社会永远摆脱不了歇斯底里一样,个人自由也永远摆脱不了其他人为之付出代价的某种特权。正是从关怀和自由之间的张力中,出现了第三种经验,出现了一个可能并不存在但却在完成其存在的世界:这是个确定经验的世界,诗歌促使我们得到这个世界,但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第120页)弗莱认为,诗和批评是意识世界的两个部分:“理解和想象的世界,[它们]既是对自由的回报又是对它的保证。”(第120页)虽然只有个人的而非社会的自由才是可能的,但包含着关怀责任的个人自由同样也处于批评道路的途中。文学不是生活,但文学与生活互为信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所在,但又被假定回避意识形态。因此,弗莱的“批评之路”既是关怀的又是自由的,而实际上两者都不是,它是自由和关怀之间的平衡。

总之,《批评之路》表明,弗莱是个将想象置于文学理论中心的批评家。他认为文学和批评是既互相关联又互相分离的两个领域,批评必须具有某种独立性和自治性,与文学拉开距离,必须是文学的一种理论。因此批评家必须运用他们的理性作出清晰的、连贯的论证,提出架构,调动他们的想象,以不同的观点面对文学中的观点。按照弗莱的看法,批评的历史是哲学、诗歌和历史之间张力的历史,批评不是其中的任何一个学科,但与它们每一个都有共同的东西。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后来的“批评理论”的先声,因此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弗莱都是一个重要的批评家。

翻译批评理论著作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不论译者多

么谨慎,对原文的理解和表达也难免会出现某些偏差;而此类著作的读者因可能要研究、参照或引用,所以对译文要求较高,又常常会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但这样说决不是想为译文中可能出现的疏漏或错误进行开脱,只是期望读者理解译者的苦衷,同时指出译文中的问题,以便及时改正,避免讹误流传。

王逢振
1997.10

作者前言

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这本书像个闹剧:一次充满其特定意义的50分钟的演讲,最后竟扩展成目前的专论著作。1968年春天,在我访问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学会期间,我作了一次公开演讲,这又导致了另一次演讲,题名《神话和逻各斯》(Mythos and Logos),是同年夏天在印第安纳大学文学院作的。这些演讲构成了本书第三、第四部分的基础,即关于锡德尼和雪莱诗辨的两个部分。1969年夏天,由威廉·贝克曼夫人基金会赞助,我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作为访问教授,在那里作了两次演讲,勾勒了关怀和自由主题的轮廓。当时,“学生动乱”一直在发展,我应邀对它作了一些评论,其中最中肯的——我用“中肯”这个词——是在王后大学的演讲和1968年秋天在杜克大学女生宿舍研讨会上的演讲。这些演讲后来分别由加拿大广播公司和塔维斯多克出版社出版,书名是《变化的伦理学》和《高级教育:需求和反应》(两本均出版于1969年),其中部分论点又出现在这里。

在那个阶段,以目前书名为题的一篇长文已基本完成,这篇文章是为1969年9月在意大利贝拉齐奥召开的一次关于人文学科研究中理论的作用的研讨会写的,于1970年在《代达罗斯》春季号上发表。在这期间,我担任了加拿大广播电视委员会的顾问,这迫使我对文学批评与交流理论的关系作了相当多的考虑——有些不太情愿,因为我认为我的同事马歇尔·麦克鲁安教授正在关注那个问题。与这篇文章的主题相一致,文中对麦克鲁安的参照并不是关于他本人的,而是关于麦克鲁安的社会原型的。这篇文章在《代达罗斯》发表以后,在我又在相距甚远的地方(如南加利福尼亚和巴基斯坦)作了一些讲演之后,我对它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并经过内心的抵制采取了一种更富历史性的论述方法,这种方法我常常

觉得有些肤浅，但似乎适合这里的论证。然后我开始做些我以为简单随意的修改，但发现自己完全是又在重写这本书。最后这项工作是在牛津大学完成的，我深深感谢联邦大学协会，感谢莫顿学院的院长和管理人员，他们共同为我提供了非常舒适的工作条件。在这段时间当中，我从第六章选出了一部分作用 BBC(英国广播公司) 关于交流的谈话，并重印在《听众》杂志上。

我在这里难以表达我对其他许多人应致的谢意。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多次演讲的主人，他们的鼓励和热情使我难以忘怀；我还想到巴基斯坦 FILM 研讨会上的许多成员，想到了贝拉齐奥研讨会上几乎所有的人；然后我想到许多学生和教员，他们听我的演讲，提出问题 and 反驳的意见。他们非常认真地提出了一些补充，并指出了许多应删改的地方。正是由于这种友好的关心——常常来自我不知姓名的人——才使可能是一长串“疏忽的错误”不致蔓延。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的主要观点都是在其它地方以其它联系论述的。然而我考虑的是，除非一个作家以前是错的，否则他就越来越少有基本上是新的东西要说。我的一位有些缺乏洞察力的批评家最近说，在我出版的每一本书里我似乎都在写我的中心神话。我当然是如此，而且我不会去阅读或相信任何不这样做的作家。但是，人们希望增加清晰度，至少增加远视的目光，而随着人们的发展，这种目光会在未来的生活中出现。

诺思洛普·弗莱

1970 年 7 月于多伦多大学、

马赛学院、维多利亚学院

目 录

总序.....	(1)
---------	-----

《批评之路》:重构文学批评

——译者前言.....	(1)
-------------	-----

作者前言.....	(1)
-----------	-----

第一章	(1)
-----------	-----

第二章	(17)
-----------	------

第三章	(34)
-----------	------

第四章	(51)
-----------	------

第五章	(70)
-----------	------

第六章	(93)
-----------	------

第七章	(111)
-----------	-------

第一章

“批评之路”按照我的理解是一个商务管理用语，是一个我在1967年蒙特利尔博览会准备期间开始听到被广泛使用的术语。我认为它同康德《纯理性批判》的结束语联系在一起，康德在那本书中说教条主义和怀疑主义都把它作为牢固的哲学阵地，并说“只有批评之路敞开”^[1]。它也同我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联系在一起。大约二十五年前，我还是个中年人，在研究布莱克预言的黑森林中迷了路，我环顾四周，寻求可以使我走出迷津的道路。当时有许多路，有些已被人踏熟并设有路标，但是它们均给我以误导。它们引导我去了解布莱克时代的社会状态，玄学传统的历史，布莱克精神里的心理因素，以及其它一些本身非常正当的问题。但我的任务非常具体，就是试图揭开布莱克象征的密码，而且我个人觉得，通向它的道路会直接穿越文学本身。我需要的批评之路是一种批评理论，它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一种看法。

凭着布莱克使我产生的爱好，我对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一个是：包含批评的整个研究对象是什么？我反对这样的答案：“批评是文学的分支，”因为那显然是无稽之谈。批评是文学的理论，而不是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次要的和非基本的因素。后面这种说法（次要的和非基本的）出自门外汉或诗人之口并不令人吃惊，但令我（现在仍然）不理解的是为什么批评家自己对自己的作用竟如此模糊，以至于也有同那些门外汉或诗人同样的观点。当然，对那些随意进入批评